

追寻远逝的民族

山戎文化探幽

孙登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追寻远逝的民族

——山戎文化探幽

孙登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远逝的民族: 山戎文化探幽 / 孙登海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303-08877-5

I. ①追… II. ②孙… III. ③古代少数民族考古—赤城县 IV. ④K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986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40 mm

印 张: 17.5

彩 插: 8 页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责任编辑: 李雪洁 腾增友 装帧设计: 李 强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作者简介



孙登海，男，汉族。1957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赤城县龙门所镇深沟村。1974年10月参加教育工作，大专学历，现任赤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副校长、河北省职业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业余时间喜欢收藏、考古、研究地质。2001年2月，在赤城县样田乡张浩村的落凤坡发现恐龙足迹化石，致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董枝明教授。董教授前往考察，确定其科学价值。之后，开始收集、调查山戎文化，走遍赤城县的河流山川，发现山戎文化遗址69处，收集山戎石器、陶器、青铜器具几百件，考察了汉文化在赤城县境内的分布情况，发现了赤城县境内千古第一县——女祁县的确切位置。2004至2007年，利用3年时间撰写完成《追寻远逝的民族——山戎文化探幽》一书。

山戎魂祭

塞外山戎，古民族之一员。踪迹已远逝，鲜为今人知。曾栖冀北地，繁衍千载余。源自赤峰来，缓步桑干去。血缘成氏族，多族为部落。临水高地居，漠然不相一。掘山梁为穴，居山崖为安。汲水于河谷，取食于高山。阳燧聚天火，炙肉且御寒。牧畜以为生，猎狩以为业，耜耕以辅食，采集以补餐。茹毛还饮血，食肉复寝皮。抔红土为陶，磨砾石为器。砾镞射野狼，红陶饮鹿血。陶轮纺野麻，骨针缝屐履，衣其皮与革，御寒且蔽体。掘沟壕成塹，筑石墙为险，抵野兽之侵袭，御他族之滋扰。安危当其首，妇孺不容怠。人不习天，天不恕人，天灾兽祸，人未立而亡者十有六七。石板为棺槨，黄土埋人骨。生者求生长，祀拜天与地。祈求安与福，作揖石丘前。畏洪水、惧野兽、忧疾病、患饥饿、独独不怕鬼。

周封召公奭燕地漫崛起。告别山林间，栖息黄土地。石铲掀谷浪，山脊飞糠粃。草丛见牛羊，河川跑马急。石搓揉皮软，淘泥烧甗器。牧畜养农开疆土，欲拓河山千万里。热河山地铸剑忙，潮白河畔缝战衣。军都山下剑生风，蠓螭塞内飞鸟鸣。妫水河边饮战马，琉璃河畔忙迁徙……挽弓射中原，振剑撼燕地。若无老马能识途，岂有秦开扫塞北？呜呼！白驹若能不过隙，春秋恐须从头启：战国七雄名谁在？齐楚山戎韩赵魏……

壮哉，山戎！威哉，山戎！陶鬲煮化春秋雪，皮胃难沐战国雨。塞外冬夏六百载，尔主寒暑三百余。嗟乎！一代马背民族，终归于何处？谁解千古迷。

忆古之山戎，金戈铁马远去，笼轡声声不闻。斗转移星，浩气犹存，仅存于天地之间；月新日异，功勋尚在，却难见于史册之内。然岁月悠悠，遗迹难灭，英名犹在。睹几多遗物，似音容依稀；考几许遗存，如铁骑重来；追千年往事，疑耳畔鏖鸣……

愚不揣鄙陋，躬身采风，潜心集物，数载不辍。撰几许文字，缅怀先族，兴怀追远，再彰其志。耿耿意诚，冀正于史，而益于今。冥冥山戎，当含笑九泉，垂昭千古矣！

序

孙登海先生出身赤城，多年来认真考察地方古代文化遗迹，特别重视先秦、秦汉时期山戎文化遗存的调查研究，完成了《追寻远逝的民族——山戎文化探幽》这部有价值的著作。

“山戎”是北方少数民族。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帝舜的时代，“百姓亲和”，“远人至”，“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文明中心区域之外的部族和部族联盟，“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北方的部族，列于首位的就是“山戎”。《史记·匈奴列传》又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按照司马迁提供的历史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早期民族学知识：“山戎”似乎应当是中原人对于“匈奴”等富有攻击性的草原民族势力的早期形态的一种称谓代号。《太平御览》卷七九九《总叙北狄》题下引《风俗通》曰：“‘胡’者，谨按《汉书》：山戎之别族也。”所谓“胡”，被理解为与“山戎”属同一族源。《水经注·漯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盖齐桓公霸世，北伐山戎，过孤竹西征，束马悬车，上卑耳之西极，故水受斯名也。”据齐桓公北伐“山戎”故事，以为其活动区域在燕山山脉。对于《匈奴列传》所谓“唐虞以上有山戎”，张守节《正义》也有较为具体的认识：“《左传·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云：‘山戎、北戎、无终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渔阳县，本北戎无终子国。’”其中有关“幽州渔阳”一带的地域指向，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接受。《太平寰宇记》卷七〇《蓟州》：“渔阳县三乡，本汉旧县。古北戎无终子国也。按杜预注《左传》：山戎、北戎、无终三名。其种一也。其后晋灭山戎，即为晋境。七国时属燕，后以为北平郡。”对于“山戎”生存之地理空间的认识，也较为明朗。

“山戎”是春秋战国时期燕齐人指称的“北戎”，大概是可以确定的。

“山戎”侵犯燕国，齐桓公应燕人之请，发兵征伐之，是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记录齐国历史走向和政策设想的《管子》书中，多次提到这场战争。《史记》一书的《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建元以来诸侯年表》、《封禅

书》、《齐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晏列传》、《匈奴列传》等，都反复说到这一战事。《盐铁论·伐功》将“齐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残令支”与赵武灵王、蒙恬事迹并列，以为“却寇虏以广地”的榜样。《说苑》书中的《贵德》、《权谋》、《指武》等篇，则从不同角度通过“齐桓公北伐山戎氏”的故事进行外交道义、礼仪与策略等多方面的儒学宣传。《汉书》的《刑法志》、《郊祀志》、《匈奴传》等，也都涉及齐桓公伐“山戎”的史实。看来，汉代人对于这一事件保留了深刻的历史记忆。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事有长久的历史反响，说明先秦时期“山戎”的文化存在必然对于中原文明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可惜历史文献的记录十分简略，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现逐渐丰富和充实对于“山戎”历史文化的认识。孙登海先生的工作，从另一个侧面对相关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此外，野外考古调查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夏鼐先生在发表于《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的《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一文中，首先说到考古调查的“目标”。他写道，考古调查的目标“是搜集资料来解决问题”。他又指出：“详细地说起来，它的目标，除了……旨在训练学员之外，主要的有下列二者：一，了解遗址的分布情况。考古调查纵使不进一步做发掘工作，仍可以解决像某一种文化的分布范围、某一时代的文化和它的地理环境的关系等问题。二，为发掘工作作准备。考古发掘工作的目标，是为解决历史科学上或考古学上的某一问题；在现今的情况下，常为配合基本建设同时保护文物。在未发掘以前，一定要先做好考古调查工作。”夏鼐先生还写道，“这一次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的调查工作，把上面所说的三个目标都包括进去了。训练班刚毕业的学员，需要参加一次比较长期的实习，以便掌握考古调查的方法。这次主要的目标，是为将来进行发掘作准备。但是发掘工作只能是重点的，而我们这次的调查，却要求全面的普查，要不分轻重，都加以记录。这些记录如果做得完善，纵使没有发掘也可以提供对于某一区域古代文化发展和分布情况的研究以头等的资料。当然，这次工作中所发现的在科学方面特别有价值的遗迹，我们不仅要进行复查，加以详细的研究，并且要选择重点，加以发掘或保护的。”

关于夏鼐先生当时说到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的调查工作”，俞伟超先生有这样的回忆：“1955年底，我到洛阳跟夏先生搞黄河水库调查，那次经历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56年初，我到三门峡搞栈道调查，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当天晚上到洛阳，第二天我

就给夏先生写信，写了十六页纸。夏先生立即决定正式勘察，调了五六个人，干了一个多月。”俞伟超先生说，“就在这时，我的道路有了一个转折，北大给我来了一封信，同意我免试读他们的研究生。”据俞伟超先生说，他在北大完成的主要工作和最初的研究实践，首先是“撰写三门峡调查报告”，“完成了邶城调查记（1961年发表），弄清了邶城的三台名称”。^①

前辈学者对于考古调查的重视，首先在于这一工作“如果做得完善”，则“纵使没有发掘也可以提供对于某一区域古代文化发展和分布情况的研究以头等的资料”。众所周知，有些古代文化遗存，可能更多的需要依靠考古调查工作方能比较完整、比较真切地认识其内涵。比如线状延续甚为辽远的古代长城、运河、道路遗迹，等等。对于面积较大的遗址的研究，也必须借助考古调查的资料。俞伟超先生等对于汉代屯田遗址的调查，就提供了较好的范式。此外，近年逐渐受到重视的生态史研究，其基础资料如有关古代河流走向和水量，古代湖泊分布和规模的资料等，也有必要依赖考古调查的工作予以积累。而对于“山戎”这样的如孙登海先生所说经济生活取“农牧混合经济”形式的民族，考察其文化也有必要借助考古调查的方式。当然，我们首先应当注意调查方法的科学性。

孙登海先生认为，“山戎人……是个半农半牧、以牧为主，具有相对稳定生活的少数民族”。也许这一意见是正确的。《管子·戒》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太平御览》卷九七九引《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看来“山戎”培育的农作物品种曾经引进到中原。不过，如果其文化特质确实表现为农耕生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难以否定这一民族初生时期流动性可能更为明显的历史真实。对于相关民族文化现象，或许交通史考察应当受到重视。通过对于赤城、丰宁出土紫贝和玉铲币，王梁堡后沟大家洼出土海贝，丰宁潮河源村出土玉人的种属材质鉴定以讨论其来源，都是有意义的。通过对青铜器遗存中剑、镞，刀或削以及铜泡和铜饰品的器型学分析以判别其民族文化倾向，也是必要的。

岑仲勉先生曾经说到交通与“民族动态”的联系（《〈中外史地考证〉前言》），严耕望先生曾经说到交通与“民族感情之融合”的联系（《〈唐代交通图考〉序言》），李学勤先生曾经说到交通与“民族关系”的联系（《〈秦汉交通史稿〉序言》），都体现出史家对交通史与民族史之关系的重视。交通史与民族史有特殊的学术渊源。中国古代交通史与民族史相交叉的领域，还存在许许多多未知的现象，有

^① 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

相当广阔的学术空间。以交通文化的视角面对民族考古的课题，也会有新的发现。就孙登海先生有所关注的石板墓（或称“石棺葬”）而言，这是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最典型的遗存（乌恩：《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也有分布。“墓中出土的陶鬲，尤其反映了与中国华北和东北的文化联系。（林沄：《石板墓》）。由西北斜向西南的草原山地文化交汇带，也正是以这一埋葬习俗，形成了历史标志。而《追寻远逝的民族——山戎文化探幽》一书中说到的华北地区的相关发现，有助于我们分析其共同性所体现的历史文化信息。此外，就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著名故事而言，所谓“束马悬车”的情节，当然也是交通史研究应当关注的现象。

孙登海先生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孙登海先生的精神也是值得鼓励的。现今许多人以登山、远足、探险等户外运动丰富自己的休闲生活，这是很好的事情。然而如果有更多的朋友像孙登海先生那样，在领略自然山水风景的同时想到探访历史人文遗存，如陆游诗句所谓“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踏寻古史的遗痕，触摸古事的印迹，亲近古人的生活，因此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为真切，更为深刻，那该是多么富有趣味的事。

王子今

2007年10月16日

于北京大有北里

自序

2001年2月，根据样田乡杨家坟村牧羊人提供的信息，我在张浩村沟口的“落凤坡”发现了恐龙足迹化石，后致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董枝明教授。4月5日，董教授一行四人，专程赴赤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后，董教授告诉我：“在‘落凤坡’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可能还有恐龙足迹化石，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寻找……”我本人是个化石爱好者，董教授的话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决心再找到几处恐龙足迹化石，为赤城县发展旅游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于是，动员几位同事，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利用星期天到落凤坡附近的山沟里去寻找。果然，在样田乡寺梁村又发现了与“落凤坡”的恐龙足迹形状相同，但小于“落凤坡”的恐龙足迹化石。可以看出，寺梁的恐龙有别于“落凤坡”的恐龙，是一个新的属种，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两处恐龙足迹化石的发现，让我很振奋。后来，又到南庄子村的河沟里去寻找恐龙足迹化石，连续找了两个星期日都没有。一次走得很累，在村子对面的山梁上休息，随便闲转的时候，拣到几枚石斧。恐龙足迹化石没找到，却拣到了几枚石斧，心里自然也很高兴。又一个星期日，再次到拾拣石斧的地方，继续寻找石器，又拣到几枚其他类型的石器。工作之余，细心观察这些石器，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候遇到的关于石斧的故事。

小时候，家境贫寒，九岁才开始上小学。七八岁时，就经常随父亲为生产队上山放牧牛羊。在山上有时能拾拣到黑色的石斧。石斧通体磨光，擦拭后黝黑发亮，十分精美。我好奇地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看后，不假思索地告诉我说：“是雷公使用的劈斧，是用来劈妖魔鬼怪的……夏天最响最响的雷声就是雷公在使用劈斧劈妖魔鬼怪……”小的时候，农村里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最愉快的事情是玩游戏、听大人们讲故事，所听到的故事大多是关于妖魔鬼怪方面的，故事听的次数多了，自然产生一种惧怕的心理。父亲的话使我感到毛骨悚然，顿生一种恐惧感！顺手便将这精美的石斧丢得很远，以后见到石斧再也不敢拾拣了。但石斧的精美形象却始终深深地印在心里，留在记忆里，至今不能忘却，有时甚至还想到丢弃石斧的地方，把扔掉的石斧重新拣回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成长为家里的“帮手”——经常上山打柴。在和同龄

的孩子们上山打柴时，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石斧，但我的心里牢记着父亲所讲的关于“劈斧”的传说，并且还要把感到有些“恐怖”的传说讲给其他孩子们听。当我们再次遇到石斧时，或者是遇而不拣，绕而远之；或者是心存恐惧，一脚将其踢飞，但石斧那精美的形象却始终铭记在我心中。遇得多了，逐渐感到有些奇怪和不可理解，有时天真地想：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妖魔鬼怪，雷公总也斩之不尽，劈之不绝呢？这妖魔鬼怪未免也太狡猾了，雷公的投掷技艺似乎也太差了，不然，怎么会到处遇见“劈斧”呢？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也在增多，特别是上了中学，老师讲中国古代历史和历史故事，听得很入迷，便对历史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历史教科书里见到古人所使用的石器的图片，其中石斧的图片和自己在山里拣到的或遇到的石斧一模一样。通过老师的讲解，茅塞顿开，方知小时候所见到的石斧并不是像父亲所说的那样，是雷公用过的“劈斧”，而是古人使用的石器，是劳动工具。正是这种石制的劳动工具才使人类告别了愚昧，走向文明；也正是这样的石器促进了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不断提高，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石器同陶器一样，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之一。

1974年10月，高中还没有毕业，我便被选拔参加了教育工作，成为民办教师。当了教师后有机会走进许多村庄，接触了许多农民朋友。空闲时，还到黄土台地上闲转，偶尔间，也能拾拣到石斧、石铲之类的东西，有的完整有的残损不全，但知道这都是先民们使用过的石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农村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农民组织起来挖土造田、平整土地，男女齐上阵，秋冬季节忙个不停，不少古文化遗址在“运动”中遭到毁坏，令人痛心和惋惜。然而，那时我年龄还小，还没有收藏意识，只是闲暇时，和农民朋友闲聊，得知他们在平整土地或挖土造田时，经常会挖出粗糙的陶罐、石器之类的东西，个别时候还会挖出满身绿锈的青铜箭镞、青铜饰品、青铜短剑等。但当地有一种传统的习俗，认为挖出死人的东西不吉利，农民们会把挖出的东西当场砸碎或扔掉。

1975年9月，在我的家乡——龙门所镇深沟村，村民们在一个叫“五十亩台子”的黄土台地上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了一处窖藏，出土针首刀币13大筐，约200多公斤。村干部把出土的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得到的回答是：这种刀币全县到处都有出土，没有什么重要价值，你们就自行处置吧！于是，这200多公斤针首刀币被村民和村里的孩子们“瓜分”一空。我有幸也得到一大把，约有100多枚吧！可惜由于窖藏时间过长，加之重视不够和保管不善，这些针首刀币遇见阳光和空气，很快就风化烂掉了，只有3枚品相比较完好的，被保存至今，收藏在册。后来，我明白了，这窖藏的200多公斤针首刀币原来是春秋、战国时期活动在赤城

县境内，一支古老的少数民族曾经使用过的一种货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于研究赤城县的古代历史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工作得闲时，经常拿出这3枚针首刀币细心观察、品味、琢磨。在观察、品味、琢磨的同时也在思考和疑问：拥有和使用过这些针首刀币的古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赤城这块土地上生产、生活并繁衍生息的？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那些石器是不是他们丢弃的？他们为什么要将石器丢到山里去？而且全县许多地方都可以拣到他们丢弃的石器呢？为什么在黄土台地上能够挖出他们的墓葬，出土他们生前使用过的陶器、石器或青铜制品呢？为什么窖藏了那么多的货币，而主人似匆忙离去再无返回，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丢弃“重金”而逃之夭夭呢？

带着这些“奇思妙想”，我渐渐对考古有了兴趣，一心想搞清楚赤城县境内到处丢弃石器和窖藏了针首刀币却又不知去向的这支古人类部族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搞清楚赤城县境内生活过的这支古人类部族与周边地区的古人类诸如华夏民族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最终旨在搞清楚赤城县久远的古代历史及其沿革。

为实现自己的心愿，我购买了考古学方面的专业书，订了考古学方面的杂志，业余时间开始钻研考古学理论，学习考古知识，考古便成为我的业余爱好。2001年4月，我开始收集、收藏农民拾拣到的石器和挖出的陶器、青铜佩饰、青铜削刀、青铜短剑等，数年不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的收集和收藏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4年1月，中国收藏家协会吸纳我为会员，石器、陶器的收集成为我的收藏主题。此次成为会员，更加坚定了我搞好收藏的信心，对我进一步搞好收集、收藏活动起到了积极的鞭策与激励作用。

人可以没有钱，但不可以没有信念。信念是一个人的事业心、进取心和理想、追求的基础，也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其实，世界上最不缺的是理想，而最缺的是将理想变成现实的人，我能成为这样的人吗？几年来，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在理想目标的感召下，我省吃俭用，数年不辍地潜心收集、收藏民间出土的陶器、石器和那些小的青铜器具。越收集越感到这些文物的珍贵，越收藏越感到它们的价值与赤城县的历史息息相关，透过它们仿佛看到了赤城县久远的过去和辉煌的未来，因为历史与未来有着不可割舍的传承关系，因而更加积极地去收集、收藏这些文物。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点历史知识、考古知识的人，应尽其所能，不能目睹境内的出土文物（不管它的价值大小）任其流失，任其损坏，任其消失而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应该尽可能地将其收集起来，为自己或他人今后研究赤城县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将来再捐献给国家，因为这些文物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

务将其收集起来，珍藏下去，留给后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收集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少人说我收集那么多破石头、烂罐子、碎瓦片子有什么用？对我的收藏行为感到不可理解。而我却如获至宝，将那些石器、陶器和大量的陶片以及石器的残损器和那些青铜制品都贴上标签，注明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和收集时间，分门别类地摆列或陈放起来，意在广泛收集材料为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实物资料。

在搞好收集、收藏活动的同时，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有关的考古文献，收集考古资料和信息，尤其注意收集和学习长城地带的考古资料。通览了张家口市的张北、康保、万全、怀安、阳原、涿鹿、蔚县、宣化、怀来、崇礼、沽源、赤城和承德市的丰宁、滦平、围场 15 个县《县志》的有关内容，记下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总之，感到只要是与研究赤城县的古代历史有关的资料和信息，都会摘抄下来，整理成册，便于研究时参考。

从所收集的陶器、石器、青铜佩饰、青铜削刀、青铜短剑等文物的共同特征和所了解的附近各县《县志》中关于各县古代历史的有关记载来看，我坚信，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久远一点，赤城县境内确实有一支古人类部族在活动，而且活动的时间很长，可能从西周时期就开始在赤城县活动了，到战国的中期或晚期，才逐步走向消亡，全部存在时间大约有近千年的历史吧！尤其应当指出的是，这支古人类部族具有浓郁的地域性特征、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色，其中青铜短剑则是他们文化与文明的标志，是研究这支古人类部族久远历史和个性文化最具考古价值的文物。

然而，谁又是这些青铜短剑的主人呢？持有这种青铜短剑的主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他们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形态、生产状况、生活状况如何呢？他们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社会关系怎样呢？他们的信仰、崇拜、审美情趣、丧葬习俗又是怎样的？他们的文化是本地产生的还是兼收并蓄而来的？他们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与中原华夏民族的关系如何呢？他们的文化与赤峰市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与鄂尔多斯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呢？他们究竟从何地而来，最终又向何处而去呢？

几年来，一大堆的疑问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确实有些不吐不快的感觉，似乎不把它写出来，不把自己的理解、分析、认识和随想等抽象的感受写在纸面上，使抽象的感受变成具体的文字就不痛快！然而，怎样才能写出来？怎样将这些问题搞清楚？用什么作为依据材料来进行分析、研究呢？仅凭收集到的一些出土文物就能搞清楚赤城县的古代历史吗？当然，出土文物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对于考古研究，对于判定文物出土地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重大，价值重要，十分珍贵。但仅有这些出土文物，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关于这些文物出土的地层关系，

有关于这些文物出土时的所在位置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丧葬形式、丧葬习俗、丧葬制度等相关信息，有大量的同类文物、同类资料或相关资料来进行比较、鉴别、印证、判断，并从中找出所蕴涵的共性特征和个性特点，通过这些特征和特点的研究，可以确定出它的文化性质和文化类型以及持器人的群体划分等。诸如：对古文化遗址、墓葬遗存、陶器组合、古文献的有关记载的考察与考证等，这些都是从事考古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手段。

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一个地方久远的古代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专业的考古力量，有专业的考古理论和经验，有专业的考古设施和设备，并有权对相关的古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等进行考古发掘，从中获取信息，进行考察、研究。而我只是一个对考古工作有着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既没有专业理论、专业知识，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所有的是对家乡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与喜爱，对家乡久远历史的好奇与探究。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我结识了几个“古瓷”小贩，在他们所收售的“古瓷”中，看到一些石器、陶器、青铜剑、青铜工具、青铜佩饰等，我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古瓷”而是文物，是西周至战国时期那支古人类部族留在赤城县的文化遗物，它对于研究赤城县的古代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只可惜这些文物在“没人当回事”的情况下，每天都有出土，每天都在流失，这对于赤城县来说是损失，是遗憾，是悲哀，是对我们古代历史的唾弃，是对先民们的最大不尊。我劝小贩们把文物交到县文博部门，他们说文博部门不给钱，还要追究责任！这些出土文物最终还是被县外的文物小贩买走。看到这些出土文物的流失，心里不免产生一种遗憾和负罪感，从此，便下决心要购买下这些出土文物，收集起来，珍藏下去！

记得东汉王充有一句话，叫做“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不了解过去就像是盲人，无法走路；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继承；唾弃历史无异于背叛。基于这样的理念和认识，我在与那些“古瓷”小贩们讨价还价的同时，还注意与这些小贩们交朋友，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戒备心理。向他们打听、了解这些文物确切的出土地点和出土信息，利用业余时间亲赴这些地方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所用。

在收集出土文物的基础上，我特别注意做好实地考察工作。考古研究是一项严肃而认真的工作，不能只听别人说，不能相信动听的故事和美好的传说，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必须亲自考察，必须相信通过考察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必须搞清楚出土文物的各方面关系，并且还要做好相关的文字记录工作。在考察过程中，我都会对自己认为是重要的发现和有价值的文物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并把由此产生的认识、体会、感受以及我的合理想象等，记录下来，整理成《考证琐记》，以便

备索。

几年来，我顶着许多议论和讥讽，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到赤城县的山川沟壑进行田野考察。没有交通工具，有时求人用摩托车送我至要去的山脚下，有时打车去，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阻止不了我“上山”的决心。我几乎走遍了赤城县所有的村庄和古人有可能栖居的地方。比如，从独石口镇的北栅子村到样田乡的灰窑子村，走遍全长近百公里的白河两岸，发现古人类大小遗址 20 多处，拾拣到各类石器上百件，收集各类陶器残片不计其数，获得了大量的关于古人类方面的文化信息，考察取得了喜不自胜的效果。考察过程中，虽然很苦、很累，有时也很危险（经常会遇到蛇），然而，一旦发现了古人类文化遗址，苦和累早已忘得烟消云散，满脸洋溢的全是喜悦。所以，田野考古是我最大的业余爱好，也是我业余时间投入最多精力要做好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在调查中还走访了许许多多的农民和牧羊人，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与我收集的出土文物有相同时间关系的几十处文化遗址，这些文化遗址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化部门组织的大规模“文物普查”活动未曾普查到的。它们分布在赤城县的黑河、白河、红河流域，这些遗址之间虽然都是崇山峻岭，有的相隔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然而，从这些文化遗址所在的地形、地貌特征，所具有的文化层位以及散落在地表的石器、陶器残片，农民从中挖出的文化遗物等诸多方面来看，它们之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有着难以想象的异曲同工之妙。我断想，这些文化遗址可能是同一时期、同一民族的古人类曾经生产、生活过的地方，这些文化遗物是同一民族的古人在同一时期使用过的生产、生活用具。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这个时期”不就是赤城县古代历史的开端吗？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古人难道不就是赤城县境内活动的最早的古人类吗？他们生产、生活的过程和他们的活动方式不就是赤城县久远的古代历史吗？

根据自己的推测和想象，我对赤城县的地理环境作了更深入的考察，以寻找“这个时期”、“这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生产、生活规律。同时，我还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张家口市崇礼、阳原、怀安、怀来、涿鹿，到承德市的丰宁、滦平、围场、隆化等县进行考察，并在丰宁等地向当地的农民购买了一些石器、陶器以作共性对比、分析、研究和借鉴之用，尤其是将两县出土的陶器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两县陶器的组合关系，以确定活动在两县的古人之间的文化类型和祖源关系。比如：将丰宁县黄旗镇出土的鬲式双耳罐与赤城县镇宁堡乡中所村出土的鬲式双耳罐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发现两地出土的文物，从造型到文化蕴涵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如出一辙的陶器组合关系，引起我浓厚的研究兴趣。为了进一步搞清楚

赤城县的古文化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之间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几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渊源关系等，我还专程赴赤峰地区进行考察。在考察、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近30年来长城地带的考古成果资料。将这些文化遗物和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综合、比较和细致的分析、研究，我感到赤城县的古代文化与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尤其是上层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同一性和天然的联系，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扩散和发展；赤城县的古代史，赤城县的古人类活动史也与长城地带其他县的古代史和古人类活动史有着相同类型的祖源关系和传承关系；赤城县古代历史的文化类型是“长城地带青铜文化”类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赤城县的古代历史与“长城地带”的古代历史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密切联系，是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赤城县的古代史研究应该放在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范围内去认识、去理解、去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否则，难以得出准确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在调查春秋至战国时期赤城县境内古代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文化类型，特别是发现了赤城县境内千古第一县——女祁县的故城遗址，更增加了要把赤城县古代历史文化搞清楚的信心。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赤城县设立女祁县，这是有史以来，官方在赤城县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县，可谓是千古第一县。然而，女祁县的治所位置究竟在什么地方？自清康熙、乾隆年间就开始有人在探寻，直至20世纪90年代前后，官方的探寻意念始终未断，但也始终未果。这次女祁县古城遗址的最终被发现，对于发掘赤城县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县城形象，是件好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女祁县故城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布局特点，结合设立时期的文化背景，顺藤摸瓜，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基本上调查清楚了汉文化在县境内的地理分布，摸清楚了西汉人在赤城县境内的活动脉络。最终，写出了上起西周中晚期，下至西汉武帝时期，赤城县境内古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生产、生活情况——可谓是搞清楚了赤城县古代历史的基本状况。

孙登海

2007年5月

于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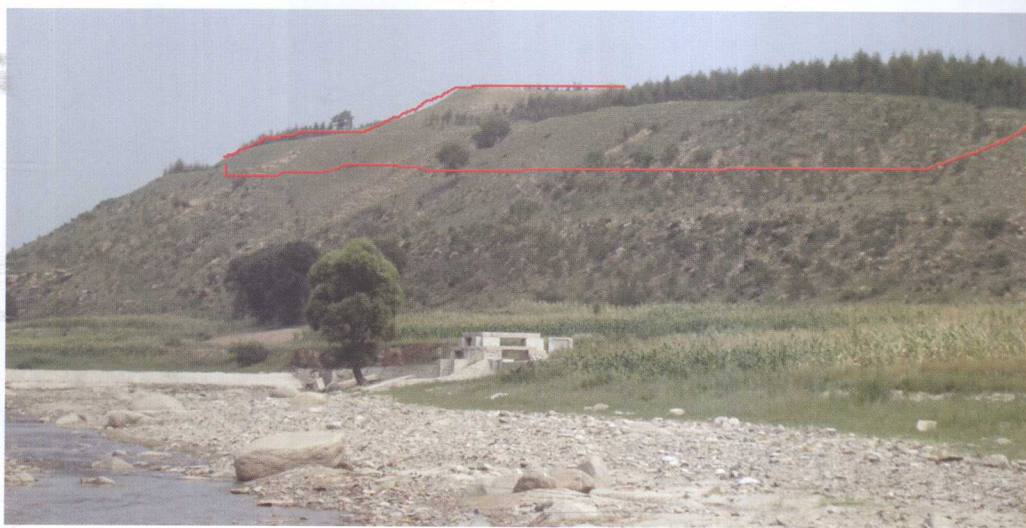


图1 古镇造阳，山戎人居址，战国时期燕设邑镇，
西汉袭用，卢绾曾在此小驻



图2 东卯镇出土岫岩玉舌形器



图3 出土于龙门所镇黑龙王沟村
小庙梁的红陶连体双口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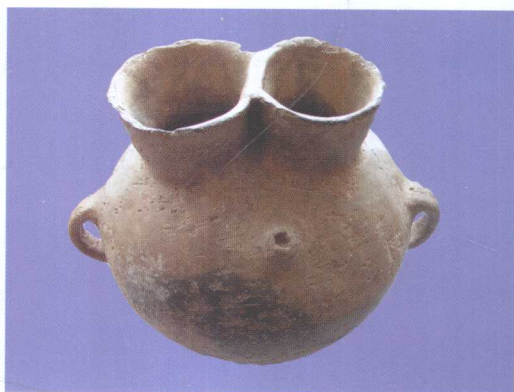


图4 丰宁县出土的红陶连体双口壶